

李禮 著

# 失敗

1891 ——— 1900

清王朝的戰爭、改革和排外

好吧，  
讓我們來試着轉動這笨重的吱呀作響的巨輪……

——曼德爾施塔姆《自由的霞光》

## 序言

# 如何敘事：中國近代史的熟悉和陌生

李禮

「復仇女神」號 (*Nemesis*) 是世界上第一艘鐵殼戰船，它駛入南半球、繞過好望角、到達東亞海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擔任主角。當英國學者安德里安·G. 馬歇爾打算為這艘戰船寫一本書時發現，僅倫敦大英圖書館的印度官方記錄文件在書架上就排開了有 14 公里長，他要的那些資料就在其中。

某種程度上，每一個現代歷史寫作者都面臨類似困境，浩如煙海的史料令人興奮，也令人窒息。比如被「復仇女神」號撞開大門的清王朝，典籍多達 8—10 萬種，檔案僅大陸地區就超過共 2000 餘萬件（冊），這還不包括浩如煙海的報刊文字。從這個意義上說，後來的研究者面對的雖是一片沃土，卻充滿了陷阱。在這片浩大的地基之上構造一座大廈也常令人生疑。

不過，按照自己的眼光搭起一座新的歷史瞭望塔倒是可行的，本書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它被一股強烈的動力推動完成：三年疫情，目睹社會巨變和無數個體命運之沉浮，重新思考這個國家和外部世界的關係。這種思考立足於現實，也必須轉向過去。歷史在這片土地上遠沒有成為前塵往事，它一直深刻地塑造着當下，並且常常壓着相似的韻腳一再重現，正如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的「二手時間」：「一百年過去了，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出現了一個二手時代」。

我之所以把目光放在 19 世紀最後十年（本書）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待出版）。一方面是因為難以把握更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段歷史無比深刻地體現了古老中國面對現代世界的挫折和轉變。19 世紀末十年，中華帝國被刻骨銘心的戰敗震驚，第一次彌散出全國性的危機感（1894—1895），仿效海外的政治改革（1898）隨後而至，不幸的是，連續的失敗至世紀末演化成巨大災難，一場國家參與動員的全民排外運動震驚了世界，並引發了新的國際戰爭（1900）；20 世紀前十年，人們目睹了現代化意義上的新政和它巨大的後果：立憲政治引入了議會制度並實施了有限民主選舉，伴之以廢科舉這樣的驚人之舉。然而改革的猶疑難以滿足被激發起來的社會期待，革命者最後勝出，帝制中國驟然終結，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意外誕生。

這一段歷史人們似乎相當熟悉，它時常出現在教科書和大眾傳媒上。不過它可能又是陌生的，其中充滿了固化的故事框架和意識形態仲裁，其中一些人和事被淡化或遮蔽了，另一些則與之相反。在很長時間裏，革命史學是 20 世紀的一個正統。它並非始於 1949 年，但新中國用一套新的理論強化了它，這種敘事件伴有一種民族主義，最終，「被侮辱和被傷害」者成功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近代史的一種基本面貌如此呈現出來。1980 年代之後，「現代化」歷史敘事重新興起，它某種程度上是對 1930 年代精英史學「現代化」敘事的回歸，後者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代表。新的現代化理論這時被引進，人們對中國重啟「現代化」抱有一種相當樂觀的期待；2000 年後歷史研究開始向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轉向，出現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不過總體而言，中文世界裏這方面的作品仍然較少。與此同時，宏觀史學敘事也並沒有獲得真正釋放，它受制於諸多制約，特別是當人們注意到以下事實：迄今為止「中國近代史」仍不是一塊開放的出版領域，蔣廷黻著作最近幾年仍屢遭刪節。

克羅齊說：「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從這個角度說，每一次新的敘事都將「創造」出新的歷史。本書很難說屬於哪一種敘事類型，從時

間上看它帶有編年體的線性時間，涉及人物多屬精英。作者並非多麼熱衷於「精英史觀」，而是承認一個事實，就本書所涉歷史，推動中國改變的力量仍主要自上而下，即使在 1895 年後一些相對邊緣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發揮力量，但他們或進入核心權力圈或藉助其力量，而且這些人以及革命領袖人物孫文等本屬知識精英，遠非普通民眾。如果我們要描述這段歷史概貌，必須首先看到少數人的核心作用，而非普羅大眾。事實上，我並不覺得關注精英人物的敘事是過去式，在中國尤其如此。這方面它和新的社會史、文化史、地方史和微觀史學一樣，需要重建敘事的努力之處還有很多。

本書把相當多的筆墨用於掃描社會變遷。我很贊成法國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所言：「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為歷史而戰》）。當然，年鉴學派所謂整體史（total history）並非無所不包，而是強調一種整體視野，即關注歷史進程中諸多因素的互動和合力。那麼，究竟哪些人和事會出現在這本書裏呢？瑞士學者布克哈特那句話也許就是我的答案：「報道一個時代在另一個時代裏認為值得注意的事實」。而且它還應該包括那些「思想史」上的事實。近代知識人和輿論史是我進入歷史研究領域後的所謂專業方向，因此常能感知觀念的威力，有時它們只是一本書、一篇文章甚至隻言片語，卻力量巨大，而且可以把更大的歷史圖景拼接起來。用哈耶克的話說：「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正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着歷史發展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擊敗最後一個帝制中國的也正是觀念。「中國還完全固守着古代對待危機的態度，儘管 19 世紀發生了那麼多讓人警醒的事件，他們仍然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本質。」德國人福蘭閣（Otto Franke）寫道，這位 1888 年—1901 年供職於駐華使領館的翻譯後來成了德國境內第一位漢學家，寫出了五卷本《中華帝國史》。

國際政治、中外交涉是貫穿本書的一條主要線索，分量較其他近代史著作較重。今天，20 世紀 50 年代頗受重視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早已風光不再，自從《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

美國的興起》(柯文)推出中文版，「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時風起，儘管一些學者隨後提出了諸多商榷或質疑，「中國中心觀」迄今仍頗得社會心理。或許強調外部世界的巨大影響並不符合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和它與眾不同的發展道路。不過只要我們從歷史本身出發，就會看到這並非事實。和西方接觸之前的清帝國已經落伍，社會結構卻相當穩定，這種秩序正是自 1840—1850 年代開始鬆散、瓦解的。19 世紀下半葉之後的自強運動、對外戰爭、變法、排外運動和立憲新政，直接原因幾乎都源於外部而非內部。可以說，北京應对外部世界時的被動和滯後，最終導致了王朝的覆亡。當然，它需要一種「合力」，事實上，衝擊說提出者費正清並沒有忽略內部因素，他在同期另一本著作裏指出：「所有研究中國近代對西方的調適都必須着手於研究中國的特殊性，正是那些特殊性才使中國對西方的一切表現得極不適應」(《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今天，人們仍需冷靜地承認，外部世界對清帝國的巨大影響並非一種落伍的陳詞濫調，而是保持了相當生命力。當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當下重新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種歷史視角值得格外關注。

如果非要說有落伍的「史學」，可能是那些罔顧事實，預設特定「中心思想」的研究和寫作。中國近代史連接着現當代史，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仍未完成，它將在何處終結也無法預料。因此我很贊同李懷印教授所言，需要用一種「在時和開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的方法重寫中國近現代史，這「不僅僅意味着在中國發現過去曾被目的論史學所遺棄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拋卻型塑現存敘事的結果驅動之視角，而將近代中國不同時期的各種暫時『結果』解釋為一系列發展跡象，代表着引導中國邁向其『近現代史』(modern history)之終極目標的多種可能性」。(《重構近代中國》)。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書中註釋較多，但並非學術意義考量。除了作者認為必要呈現的一些重要文獻，其他多為引申閱讀之意，以備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考。如此一來，正文可以保持相對簡潔，得以快

節奏推進。註中也涉及到少量有爭議的學術問題，它們相當蕪雜，無法列出足夠多或新的文獻，這種情況下往往只做了典型選取，即作者較為認可的說法。初稿完成後作者有計劃做一次大範圍文獻檢索用於註釋，不過最終作罷，因為本書無力承擔過多訴求。它雖是一種嚴肅寫作卻並非學術作品，而是面對一般公眾，而且可以說是一部「簡史」，立意並非提供細節或學術辯駁。本書旨在提供一種新的近代史「文本」，激發新的興趣和思考，從而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包括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人們常說，史無定法，不過這種寫作對我來說仍是一次新挑戰，作者無法確定它是否會受到歡迎，也許唯一能保證的，就是下筆時的誠意和良知。



# 目錄

序言 如何敘事：中國近代史的熟悉和陌生 i

引子 001

第一章 005

---

1891年春天，南方傳來的消息讓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們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觸目驚心的報道 006 / 1891年7月18日，74歲的郭嵩燾在湖南落寞去世，直到此時，他撰寫的《使西紀程》也沒能得到北京原諒 008 / 長江兩岸動盪不斷的這一年，武漢迎來了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 010 / 「我們日本人非常擔心俄國建設西比利亞鐵路。」1891年6月，稻垣滿次郎在《東方策》一書裏寫道 012 / 糟糕的海防和俄國的東方野心被廣東秀才康有為注意到了，他判定朝鮮會成為一個火藥桶 015

## 第二章

027

「光緒帝正在學英文，這可能成為中國振興的轉機。」1892 年春節剛過，《萬國公報》隆重介紹說 028 / 新學堂裏的英語課其實早已開始，教會學校是主力軍 030 / 輔仁文社成立於兩年前，最早加入的 16 個人背景相似：少年時代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之後供職於洋行、公司 032 / 1892 年 5 月 10 日，34 歲的袁世凱從天津返回漢城，繼續大清駐朝鮮通商大臣的角色 035

## 第三章

049

1893 年時值哥倫布發現美洲 400 週年，因此這一年的芝加哥世博會顯得意義非凡 050 / 當鄭觀應請陳熾為《盛世危言》撰寫序言時，陳感歎說，自己的《庸書》可以不寫了 052 / 1893 年下半年，上海的西方人比往常更忙碌一些。11 月 17 日是「開埠」50 週年紀念日 054 / 薛福成是格致書院命題者之一，1893 年他的一個建議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057

## 第四章

071

1894 年春天，各地讀書人來到京城，參加為太后壽誕增加的一次「恩科」 072 / 直到 5 月中旬，漢城裏的各國外交官仍搞不清東學黨到底實力如何 074 / 7 月 17 日，日本大本營召開御前會議，決議開戰 077 / 黃海之戰一週後，赫德批評路透社刊發的一篇評論把丁汝昌說得太好了 080 / 「市街都是高懸國旗，懸掛燈籠無異於節日」，龜井茲明出發不久寫道 082 / 儘管出現了一些批評日本的聲音，卻改變不了清王朝在西方人眼裏的野蠻形象，北京城裏繼續上演的慶典可能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085

## 第五章

097

北京發出的求和信號沒能阻擋日本人的新進攻，1895 年 1 月 20 日，日軍登陸榮成灣 098 / 3 月 19 日，李鴻章一行抵達下關，一場艱難的談判之旅就此展開 100 / 5 月 8 日，日本內閣書記官伊東已代治、中國二品頂戴候選道伍廷芳、三品銜升用道聯芳在煙台換約，《馬關條約》由此正式生效 102 / 戰勝國的喜悅還沒來得及完全釋放，俄、德、法三國忽然出手，阻止日本人向歐亞大陸繼續橫衝直撞 104 / 《馬關條約》簽訂這一年，幾乎很少有中國人注意到無線電傳輸、X 光診斷儀、電影放映機這些東西已經發明出來 107 / 康有為師徒是來京考生中最活躍的一批人，1895 年梁啟超運氣不佳，會試再次落第，康有為以第八名得中進士 110 / 這一年春天，康、梁和興中會核心人物陳少白在上海一家旅館偶遇，他們談論了幾個小時 112

## 第六章

127

《馬關條約》引發的憤怒和不安傳遞到了新的一年，而且這種情緒影響到了更多人 128 / 張之洞派去主持上海強學會的汪康年早想辦一張報紙。他和汪大燮同族，杭州汪氏以「振綺堂」藏書聞名 130 / 呼籲變革的輿論重心轉入上海，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改革的指揮棒已從李鴻章那些老人手裏交了出來 132 / 與俄國之行相比，美國無疑是李鴻章此行最不了解的另一個世界 135

## 第七章

147

到目前為止，中國似乎從巨大的戰敗陰影裏重新站了起來，尤其對商業來說 148 / 時務學堂醞釀於 1896 年冬天，一開始是幾位士紳籌備一家公司的產物，打算開的課程相當實用 150 / 湖南的學堂和報紙比如《湘學報》常有大膽之論。但這一年讓張之洞警惕的卻是《時務報》上的一些文章 153 / 德國人一直想拿到一塊租界作為海軍基地，最初的理由是建一個儲煤站 155

## 第八章

167

1898 年是以史無前例的屈辱開始的 168 / 光緒急於行動，1898 年一開始就一直想做點甚麼 170 / 從 1898 年初開始，湖南變法人士的日子就越來越不好過 173 / 《時務報》改官報的提議很快摧毀了這張報紙的公共形象，而且迅速引發一場產權之爭，它撕去了改革陣營的表面團結 175 / 「近來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張元濟 7 月 17 日在一封信裏擔憂地說 177 / 9 月 18 日下午，御史楊崇伊的一份訓政奏摺送抵頤和園，慈禧當晚決定第二天還宮 180 / 9 月 29 日夜，康有為抵達香港。翌日英國皇家海軍少將、議員貝思福剛好到來，他的中國之旅於是從會見一位流亡者開始 183 / 北京外交界和西方觀察家同情變法者，卻並不打算干預政變或提出抗議 185

## 第九章

201

1898 年末，一個由朝鮮知識精英組成的獨立協會被解散，多名成員遭拘捕 202 / 上一年瓜分熱潮的餘溫似乎仍在發酵，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在這一年紛紛擴張地盤 204 / 1899 年 3 月，法國主教樊國梁和總理衙門議定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條款》獲准頒行，傳教士的「官員」身份由此被法理化了 207 / 「毓賢是主要的罪犯」，英國公使竇納樂認為其他人只是聽其指揮 209 / 「清國流亡政治家康有為在前往倫敦途中到達此地，並向他的同胞們講述他為何要推翻現政府及目前清國國內的危機……」 211

## 第十章

223

庚子年春節的喜慶氣氛有些不足，不少人覺得這一年有個閏月很不吉利 224 / 1900年1月11日的一條上諭讓外國人大吃一驚，它把義和團和民間團練混為一談，稱如果這些人安分守法，可以聽其自便 227 / 6月16日，慈禧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太常寺卿袁昶指責義和團為亂民，太后卻覺得「人心」可用 231 / 6月25日，槍炮聲突然啞火，一塊牌子被立到英國使館北面的橋上，上面寫着：「欽奉懿旨，力護公使館，嚴禁開火。」 234 / 8月10日晚上，使館區收到一份日軍來信，稱救援軍隊將於8月13或14日抵達 237 / 慈禧及時躲過了自己點燃的戰火，8月15日從德勝門匆忙撤離 240 / 張之洞、劉坤一是「東南互保」官方發起人，不過承擔起中外溝通的是盛宣懷 242 / 8月21日，皇室流亡之旅抵達宣化府。次日，張之洞在武漢處決了自立軍領袖唐才常 245

## 第十一章

261

「孫逸仙樂意地談及他最近組織的革命活動。他取下地圖，指出作戰地點和起義者的進軍路線」 262 / 1900年12月12日至1901年4月底，各國派遣到華北各地的遠征軍超過46支 265 / 這一年李鴻章的身體明顯垮了，從1901年初開始，北京的西方人便注意到李日益消瘦 268 / 使館區解除危機後，赫德寫文章上了癮 271

## 引子

1891年12月，一部連載於《萬國公報》的外國幻想小說《回頭看紀略》抓住了不少中國人眼球<sup>1</sup>。這部小說原名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寫得腦洞大開：一位住波士頓的年輕人在1887年被催眠睡去，公元2000年9月10日醒來後，發現美國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此書風行美利堅，「自《湯姆叔叔的小屋》發表以來，還沒有哪一本書贏得過如此多的讀者」<sup>2</sup>。政治理想可以通過小說來傾訴，過不了多久，這種手段中國人也學會了<sup>3</sup>。

小說的譯者是李提摩太，這一年10月他剛被赫德推薦出任「同文書會」總幹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是該組織39個發起人之一<sup>4</sup>。「同文書會」旨在傳播基督教及一般常識。這些發起者認定士紳而非皇帝，才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這個古老國家之所以反對西方的一切，「幾乎完全是因為無知」<sup>5</sup>。上任後，李提摩太把目標瞄準讀書人，贈書是老辦法，卻並不容易。他們有時也派送《萬國公報》（1889年發放了1200份《萬國公報》到北京和幾個省會城市），這是第一份提供新聞報道和背景文章（background essays）的中文雜誌。它別開生面，備受好評，但長期入不敷出，中國人也不習慣出錢購買西方人的出版物<sup>6</sup>。儘管如此，外來者批評的聲音還是可以通過新式報紙放大，被越來越多的中國精英關注，包括一些高級官員。這方面李提摩太很在行，1890年7月他受李鴻章邀請到天津主持《時

報》，堅持每天撰寫一則評論，一共寫了 200 多篇，其中很多內容旨在討論如何讓中國進步。

李提摩太出生於威爾斯的一個村莊，1870 年由英國浸禮會差遣來華，之後很長時間呆在華北。在太原，他和妻子住在一個中國人的房子裏，穿中式衣服，吃中國飯菜。山西的風很大，他突發奇想，拿出一筆獎金，說要發給第一個發明飛行機器的中國人，可惜沒有結果<sup>7</sup>。到 1891 年，他踏上這片土地已過去了 20 年，這位英國傳教士成了一位著名的中國通。他發現，比起官員，士紳群體更保守，而且常常煽動排外。在 1890 年上海召開的基督教全國代表大會上 (Missionary Conference)，李提摩太提到新出版的一本《經世文》如何大肆攻擊基督徒，警告說：「我們處在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口的邊緣。」<sup>8</sup>

另一位傳教士，英國人秀耀春在大會宣讀了一篇論文：《中國的秘密會社》 (*Secret Sects of China*)<sup>9</sup>。這位中國文學研究先驅者沒想到，十年後他會死於一場很像秘密社會的騷亂 (義和團)。

這次大會結束沒不久，一場迄今為止最猛烈的排外運動爆發了。

## 註釋

- 1 《萬國公報》原名《中國教會新報》(CHURCH NEWS)，1868年9月在上海創刊，主辦人為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傳教士人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報紙1872年8月改名為《教會新報》，1874年9月改名為《萬國公報》。1883年停刊。1889年2月《萬國公報》復刊後改週刊為月刊。1907年7月報紙因林樂知當年去世而終止。

《萬國公報》(第三十五期)於1891年12月刊發題為《回頭看紀略》(作者署名為「析津來稿」)，該文一直連載到1892年4月(第三十九期)。參見《萬國公報期刊目錄》，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9—303頁。

- 2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寫於1888年，今譯作《回顧：公元2000—1887年》(商務印書館，1997年)，作者為美國作家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美國學者沃濃·路易·帕靈頓認為，愛德華·貝拉米很可能在德國學習期間接觸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參見(美)沃濃·路易·帕靈頓著，陳永國等譯：《美國思想史：1620—1920》，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7頁。「這篇著作在19世紀90年代曾風行一時，引出一批書來討論它陳述的種種制度和原則。它是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出發、經過認真的經濟分析的產物，對當代經濟進退兩難的窘境進行了獨創性的、全面的論述。」參見(美)赫茨勒著，張兆麟等譯：《烏托邦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21頁。

- 3 立於「新小說」潮頭的代表人物是嚴復和梁啟超。(可參閱張漢良譯：《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夏志清《中國文學縱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9—231頁)。值得一提的是，馬丁·貝爾納在《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中提到，康有為《大同書》和貝拉米的*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有許多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儘管康有為從未提及貝著，但譚嗣同、梁啟超都曾是該書1896年版的讀者。康可能讀過該書，不過真正激發他的是收錄於十三經《禮記》中的《大同》。見(瑞典)馬悅然著，唐海東譯：《反思古代史，想像現代烏托邦》，李怡、毛迅主編：《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31)，巴蜀書社，2020年，第6頁。

- 4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國傳教士，近代來華最著名傳教士之一。李提摩太1870年來華，先後在山東、山西傳教、賑災，1891到上海主持同文書會(後改名廣學會)，翻譯書籍，一直到1916年卸任。他主持的報紙和翻譯的圖書對晚清知識精英和開明官員影響很大。

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生於北愛爾蘭，1853年畢業於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1854年來華，曾任英國駐寧波領事館翻譯，1859年任廣州粵海關副稅務司，1863年11月正式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總稅務署1865年從上海遷到北京)，從此赫德居住北京四十多年。1896年清政府開辦國家郵

政，他兼任總郵政司，1908年告假歸國，1911年9月病逝於英國。

- 5 「同文書會」由英國傳教士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 於 1887 年 11 月在上海成立，英文名為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意為「在中國人當中廣泛傳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識的會社」。1887 年同文書會計劃書稱：「我們對於中國的開放永遠不會感到滿意，直到我們能將中國人的頭腦也開放起來。他們反對西方的觀點、計劃以及商業、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動，幾乎完全是由於無知。……因此，消除這種無知，在人民各階層中推廣學識，就具有極端的重要性。但是，我們發現往往是北京的大員和開明的官員們已準備接受外國人的建議，而地方上的文人士紳卻進行阻撓，並且能有效地阻塞一切進程。這般文人士紳們遍佈於帝國各地並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實上他們乃是這個帝國的真正的靈魂和實際的統治者，所以很顯然，如果要影響中國整個國家，我們就必須從這些人開始。」《同文書會章程職員名單計劃書和司庫報告》，該計劃書相關分析見盧漢超《中國第一客卿：驚賓·赫德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頁。
- 6 1876年2月，主編林樂知曾發表唯一一份《萬國公報》財務聲明，他列舉了經濟困難的幾個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國人買不起雜誌」。其他理由還包括「以前傳教士都是免費分發書籍和小冊子，以致中國人不太習慣出錢購買西方人的出版物」，「負責發行的中國代理商也沒有努力拓展渠道。這些代理商有時通過出租雜誌來吸引讀者的注意而不是努力去擴大訂閱者的人群」。《教會新報》改名《萬國公報》出版次年(1875年)，報紙的訂閱收入和廣告總收入不超過2000美元。除了傳教士團董事會500美元撥款，林樂知自己支付200美元。(美)貝奈特著，金瑩譯：《傳教士新聞工作者在中國：林樂知和他的雜誌(1860—188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41頁。
- 7 儘管並沒有人發明飛行器，「然而，山西省的人們都記住了李提摩太的這筆獎金」。(英)蘇慧廉著，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李提摩太在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1頁。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英國偕我公會教士，1882年來華，在溫州、寧波傳教。1907年任山西大學西齋總教習，1920年任牛津大學第三任漢學講座教授。
- 8 (英)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2頁。
- 9 秀耀春(Francis Huberty James, 1856—1900)，英國浸禮會教士，1883年來華，在山東青州傳教，1892年回國後1897年再次來華，擔任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專職翻譯，1898年被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韜良選為教習，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失蹤遇害。秀耀春是一位中國文學研究專家，1898年曾在亞洲文會上宣讀一篇題為《中國文學》的長文，「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最早以西方的視角來概述中國文學的一篇專文」。(沈弘：《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和先行者——記三位京師大學堂的西教習》，《中國科學報》，2015年9月25日)。

# 1891

## 第一章

---



## 一

1891年春天，南方傳來的消息讓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們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觸目驚心的報道，比如以下這份，一位目擊蕪湖騷亂的法國傳教士描述說：

5月10日傍晚，「正當教會僱用的兩位女教民走出教堂，穿過離道台衙門不遠的運河南區的一條街道時，突然遭人毆打，並被粗暴地揪住，拖到保甲局。她們被指控曾用迷藥誘拐過兩個幼孩；作為人證，兩個幼孩，一個五歲，一個七歲，被帶了進來，據說他們是這兩位女人的受害者。」一天後天主堂被一群中國居民包圍，道台拒絕援助，知縣卻挺身而出，幫助幾個傳教士逃到長江上的太古公司輪船，「他們親眼看到他們教堂的所有房子正燃起熊熊火光」，不久有消息說，「有兩位教士的墳墓已被撬開」<sup>1</sup>。

蕪湖是安徽省教務管理中心，此前中外雙方相安無事，從未發生衝突。幾乎與此同時，九江、宜昌、丹陽、無錫等相鄰幾個省的城市也爆發了針對西方教會及社區的騷亂。湖南被深入調查的傳教士指責為「排外」中心，當地民眾對教會的敵意確實由來已久<sup>2</sup>。《湖南合省公檄》這樣的反洋教小冊子1860年代之後廣為印刷。據說直到1886年，還沒有一個外國人進入湖南省會長沙<sup>3</sup>。

新的排外怒火和一位湖南寧鄉籍官員周漢大有關係，1891年他編寫、印製了一批小冊子，發行人數最大的名為《鬼教該死》（也有版本稱為《鬼叫該死》）。他自稱書由八個人捐印，每人十萬冊，贊助者用的是萬里城、師孔、齊心戰這些明顯的假名字。即使沒有宣傳的那麼多，這本書的印量也相當驚人，它大約3700字，用白話文撰寫，長江沿岸很多老百姓讀過，多數人覺得痛快，因為「鬼」字很符合他們的口味<sup>4</sup>。1891年各地流傳的謠言裏，集中指控了傳教士拐帶孩子和用他們的眼睛製藥，這些顯然都不是人幹的事。

《北京條約》（1860年）讓傳教士得以深入長江腹地，這一影響深遠的權利是充當翻譯的法國傳教士艾嘉略私自增加的（這件事直到此時還沒有

被中國發現)<sup>5</sup>。自那此後，一座座新教堂拔地而起，它和出入其中的本地教民讓很多人深感不安。就儒家精英而言，禁止祭祖卻祈禱上帝（以及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令人氣憤，「這是在不停頓地切割中國傳統的家族和諧與血緣紐帶延續的夷化行為，這無疑是一種異文化的挑戰」<sup>6</sup>。

周漢經常用鬼子、一隻或一群羊代替「洋人」。教士、教民被叫做「鬼」、「鬼夫人」，後來叫的最多的是「中國豬叫」<sup>7</sup>。在一張名為「鬼拜豬精圖」的印刷畫裏，兩個洋人狼狽地跪在一頭豬面前，豬的身體上寫着「耶蘇」。類似風格的小冊子還有很多，據不同統計，出自周漢的印刷品至少有30—50種，裏面畫了很多洋人幹的壞事，比如偷挖人眼和內臟，「豬叫取胎圖」、「小兒失腎圖」出現在眾多小冊子裏。這些指控其實毫不新鮮，很多地區都流行過類似謠言。它「是一種刻板印象式的對食人誘拐行為的恐懼」，實則來自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傳教士不過是傳統觀念上那些需為誘拐事件負責的外來群體的一個新例子而已」<sup>8</sup>。

讓兩湖地區最高長官張之洞感到棘手的，是周漢的身份和文化立場。此人自詡「周孔徒」，並非等閒之輩，曾跟隨左宗棠出征西北，後官居陝西候補道，1884年因病返湘住在省城。周漢對西方人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來自絞殺太平軍的回憶，他認為後者是一支基督教軍隊，既然湘軍擊敗了它，那麼眼下「也應該組織起來打擊基督教經文的新散播者——傳教士和因他們而皈依的基督徒」<sup>9</sup>。不過他的武器如今變成了印刷品，西方人稱之為「湖南出版物」，這些免費的小冊子圖文並茂，生動活潑，而且經常是彩色的。

這年9月，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sup>10</sup>得到了一本《鬼叫該死》，那是另外一個傳教士從黃陂縣帶回來的，他向漢口領事館舉報此事，當地幾家發放小冊子的當舖被罰款四千兩，但無法查出源頭。楊格非聽說過周漢，但一直無法確定，不過他不久得到了一份周漢給湖北巡撫譚繼洵函件的副本，周在其中承認印刷品出自於他。作為最早深入內陸的幾名傳教士之一，楊格非1867年就創辦了漢口「書報部」，幾年內向華中幾個省發放了35萬部福音書<sup>11</sup>。他相信這些書一旦流行便能改變中國老百姓。沒料到印刷品

如今反過來被用來對付教會。「在湖南流傳的諸多書籍，都無一例外對基督教大肆污衊，說耶穌信徒放蕩不羈，縱慾無度；上帝被醜化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一隻豬，周圍滿是男女信眾，他們或跪着，或在交媾。」<sup>12</sup> 他給上海《每日新聞報》去信說。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援引這封信時注意到，隨着小冊子一起出現的是對中國人的警告，比如一個告示稱，庇護洋人的家族一經發現，將被冠以「豬羊鬼子家族」。明恩溥剛出版了《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他用「面子」概況了中國人的性格<sup>13</sup>。

## 二

1891年7月18日，74歲的郭嵩燾在湖南落寞去世，直到此時，他撰寫的《使西紀程》也沒能得到北京原諒。這本書因親西方備受指責，周漢對郭嵩燾一直非常不滿，把他和另外三個湖南人稱為「四鬼」<sup>14</sup>。1876年，郭嵩燾因「馬嘉理案」受命赴英國道歉，意外成為清廷首位駐外公使<sup>15</sup>。他視野開闊，很早就看出西方人志在貿易而非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十幾次給主戰將領僧格林沁寫信反對和英法聯軍開戰。歐洲見聞進一步提高了他的眼光<sup>16</sup>。不過對西方的欣賞讓郭嵩燾淪為很多人眼裏的敗類，他寫的《使西紀程》1878年被毀版，同僚指責他的罪名不無誇張，比如觀遊炮台時披了一下洋人衣服，以及白金漢宮聽音樂會時取閱音樂單。當他從英國回國從上海前往長沙時，長沙、善化的士紳不許用小火輪拖他的船靠岸<sup>17</sup>。

郭嵩燾去世前後，湖廣當局對排外活動採取了一些措施，但無法遏制其勢頭。1891年11月，漢口外交使團聯合通過了一份抗議書，指責張之洞未能認真查處，導致成千上萬的小冊子仍在公開發售。在英國駐漢口領事要求下，張之洞關閉了幾個印刷據點，並責令湖南巡撫抓了長沙寶善堂的三個刻字商，但因證據不足被釋放了。事實上，張之洞沒打算重責周漢，而且害怕長沙因此發生騷亂，攻擊本地教徒。他想把周漢調往甘肅或新疆任職，沒有成功。此後，德國公使巴蘭德附上湖南小冊子向總理衙門告狀，後者只得繼續向武漢施壓。

讓張之洞頭疼的遠不止周漢，1891年6月至9月，湖北爆發了武穴、宜昌教案。武穴距離蕪湖不遠，因懷疑一位天主教教民用籬筐挑的4名幼兒要送到對岸九江天主堂「挖眼蒸食」，千餘人搗毀了當地福音堂，打死了一名海關英國檢查員和一名傳教士；在宜昌，人們圍堵聖母堂，燒毀了幾座教堂，4名來自法國、比利時、意大利的傳教士被毆傷，修建中的英國領事館被破壞<sup>18</sup>。面對9國公使聯名抗議和開來20多艘軍艦的威脅，張之洞只能妥協，最後鞭笞杖或充軍了12人，賠償白銀175700餘兩。

「當外國領事調來炮艦為傳教活動撐腰的時候，那些在他們的領事館幹活的中國苦力們卻知道，傳教士作為一個整體，並不被那些層次較高的外國人當成道德教師。」<sup>19</sup>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為此憤憤不平。這位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出生於馬來西亞，是華人中罕見的語言天才。他為排外事件投書上海《字林西報》，用英文發表了《為吾國吾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騷亂關係論》（7月24日），認為外國公眾只聽到騷亂中傳教士的一面之辭，中國人的聲音卻聽不到。辜鴻銘批駁傳教士蠻橫，四處惹事。「在中國人受到外國公眾輿論的道德遣責之前，請拿出證據來說明這些騷亂不是日積月累的侮辱和傷害所激起的憤慨的爆發。至於那些關於嬰兒及其眼珠的傳聞，其實不過是點燃這場隨時可燃的烈焰的導火索罷了。」<sup>20</sup>

辜鴻銘的言論被《泰晤士報》部分轉載，遭到很多人批評，很多人奇怪他為何在英國受到教會熏陶，卻「公開敵視把基督教傳入中國」<sup>21</sup>。也不明白他解釋傳教士禍害中國的各種理由，比如太平天國運動，辜鴻銘稱之為基督教引發的「中國棄民的叛亂」，正是這場內戰改變了中國，如同把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變成形容枯槁的老婦人<sup>22</sup>。

有一個西方人眼下正打算效仿太平軍時代轟轟烈烈的西方前輩，他就是鎮江海關幫辦稅務、英國人梅生（Charles Welsh Mason）。他打算加入湖北哥老會的一次暴動，後者計劃這一年11月16日行動，從沙市發起一場長江「起義」。梅生參加了哥老會6月在南京附近的一次會議，決定幫暴動者走私軍火。隨後他以去日本度假為名前往香港購買，武器後來由「濟雲」號經上海運往鎮江，不過上海海關稅務司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 拒絕配合。9月12日，梅生剛到鎮江即遭查捕，冒險家之夢就此破滅。憑藉治外法權，他只被判九個月監禁，罪行是身上搜出的5磅炸藥。

「梅生事件」成了總理衙門反擊西方人的一個把柄，不過總稅務司赫德深諳官場之道，以袖手旁觀的姿態儘量淡化此事，幾個月後，果然就沒多少人再關注它了。當1892年夏天梅生被釋放時，輿論幾乎忘記了他。此人回到倫敦卻再次興奮起來，聲稱自己參加哥老會的行動，「完全是基於為被壓迫的人民爭取自由的激情」<sup>23</sup>。

### 三

長江兩岸動盪不斷的這一年，武漢迎來了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上一年11月他啟動了文明古國之旅，前往希臘、埃及、印度以及中國和日本。這次旅行讓尼古拉後來成為唯一到過亞洲的俄國皇帝<sup>24</sup>。

1891年4月19日，俄國人結束廣州訪問後從海路轉至長江，不久來到漢口。「前來拜訪殿下（乘坐裝飾華美的快艇，隨從身着盛裝）的是湖廣總督，中國著名的文人張之洞」，一位隨行俄國人寫道：「他在李翰章之前執政於廣州，明顯表露出不喜歡歐洲人，同時也非常尊重西方所達到的物質進步。」<sup>25</sup>4月20日，兩艘俄國軍艦和五十艘中國炮艇護送尼古拉一行前往漢陽晴川閣，他們沒有感覺到傳說中的敵意，兩岸士兵齊射鳴槍致意，總督則在宴會上為沙皇、皇后舉杯，尼古拉還吃驚地注意到了說一口流利俄語的辜鴻銘。

除出席了當地東正教教堂的一次宗教儀式，尼古拉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參觀「莫爾恰諾夫與彼恰特諾夫公司」，它屬「新泰洋行」，以製作茶葉聞名。這一年正值公司成立25週年。茶是中俄貿易最重要的商品之一，1860年代後俄商不僅從漢口收購，而且深入鄂南茶區，陸續在附近開辦了8個茶廠，其中3家磚茶廠陸續搬到了漢口，在英租界、俄租界濱江地帶建造起高大茶葉廠房，它們成為武漢最早的一批外資機器工廠。當英國商人把購茶重點轉向印度、錫蘭後，俄商1890年後壟斷了漢口茶市<sup>26</sup>。1891

年，這裏茶葉出口總量的大約 7 成送往俄國。為了歡迎貴賓到來，俄國茶廠特意推出了一款歡迎尼古拉的定製茶磚，茶廠主人懇請「以殿下之名義在皇家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中文—蒙古文—滿文部設立獎學金」<sup>27</sup>。

逗留數日後，俄國皇室旅行團離開湖北駛向日本。很快，尼古拉被島國異域風情迷住了，在長崎和鹿兒島，他變成了一位熱情的觀光客，誰知當這些人抵達京都，迎接他們的卻是一場刺殺。

事情發生在距離京都 8 公里的大津。5 月 11 日，坐在人力車上的尼古拉忽然遭到一名護衛警察佩刀襲擊，他頭部受傷，從人力車上跳到路上躲開了第二刀，尼古拉想躲到當地人群中，但他們已嚇得四散奔逃。不過隨行的希臘皇子用柺杖擊倒了行兇者，車伕和巡警隨後一起制服了他。此人名叫津田三藏，很可能是憤怒於割讓庫頁島或不滿俄國人先去消遣而沒先去見天皇，他覺得尼古拉的訪問實為考察「地理形勢」，為將來的侵略做準備<sup>28</sup>。這種想法並非胡思亂想，當時很多日本人懷疑俄國人是來刺探情報的。

刺殺震動全國，明治維新至此早已開花結果，刺殺外國皇室成員無疑破壞了「文明國家」形象。兩天後，明治天皇親往京都慰問。尼古拉對他印象不佳，覺得天皇舉止奇怪，神情恍惚，儘管日記裏他聲稱此事不影響自己喜歡日本，對天皇卻相當反感。這種輕視一直持續影響着尼古拉，到他繼承皇位後也揮之不去。

成千上萬的慰問信、禮物飛向貴賓，在重辦兇手的洶洶輿論中，日本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卻拒絕了總理大臣等人的警告，堅持不應處死刺客，因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加害皇室（天皇、皇后或皇太子）者處以死刑之規並不適用於外國皇太子。他頂住壓力，指示並說服了主審法官，5 月 25 日以「謀殺普通人未遂罪」判處刺殺者無期徒刑（最高刑罰）。司法獨立取得了某種勝利，而且此舉為努力廢除治外法權的明治政府帶來了積極影響。不過監禁於北海道的兇手幾個月後可疑地病死。

尼古拉提前中止了訪問，5 月 19 日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頭裹紗布出席了西伯利亞鐵路開工典禮，在那裏立下了一塊奠基石（5 月

31日)。以殖民創造國家歷史的俄羅斯人對廣袤空間似乎有一種格外的偏愛，開疆拓土一直是俄國歷史中的主要事情<sup>29</sup>。1830年代發明的火車快速改變了世界，「19世紀第三個25年是第一個真正的鐵路時代」<sup>30</sup>。輸掉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後，俄國人被迫大幅轉向亞洲——西伯利亞鐵路1887年後被確定為國家戰略<sup>31</sup>。1891年3月17日，俄國正式向世界宣佈：修築一條莫斯科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6月1日，這項19世紀最巨大的工程東段開工了。如果說過去「俄羅斯帝國在近東中東和遠東連綿不斷的大陸上蠢笨地爬行」，如今它即將飛了起來<sup>32</sup>。

歐洲列強與東亞的交通迄今為止仍是英國控制的地中海、印度洋通道，儘管1873年後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動搖了大英帝國的世界霸權<sup>33</sup>。不過維多利亞時代光輝猶存，1890年，「世界上63%的混合船隻出航時，都懸掛着英國國旗」<sup>34</sup>。

德國和法國程度不同地支持俄國重心東移，特別是1891年8月，俄國駐法大使和法國外長達成一項政治協定：法、俄兩國一方受到侵略威脅時，雙方應立即同時採取措施。此舉經過不斷細化，實際形成了法、俄軍事同盟，它不斷延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sup>35</sup>。俄國因此得以確保西部歐洲邊境，他們可以更有信心地把手伸到遠東。

日本對這種變化非常警覺。此前俄國在遠東只有大約10000名士兵，西伯利亞鐵路意味着他們可以把整個帝國的軍隊快速運來，這讓新興的東方強國相當不安。

#### 四

「我們日本人非常擔心俄國建設西伯利亞鐵路。」1891年6月，稻垣滿次郎在《東方策》一書裏寫道。這位劍橋大學高材生8月出版了《西伯利亞鐵路論》，這本書很快暢銷全國。不過作者認為俄國的對手很可能是英國，日本不必過分擔心<sup>36</sup>。這一年，前外務卿副島種臣設立了「東邦協會」，稻垣滿次郎是其中骨幹之一。「東邦協會」旨在提倡一種亞細亞主

義，即日本帶領東方對抗西方。

在政界，最擔心西伯利亞鐵路的人是山縣有朋。上一年，時任內閣總理的山縣在自己起草的《外交政略論》裏提到了對這條鐵路的擔心。當年12月，他在首屆帝國議會發表的施政方針，再次強調朝鮮是日本「利益線」焦點所在。山縣有朋認為，西伯利亞鐵路完工之時，將是朝鮮多事之秋。

朝鮮「是指向日本心臟的匕首」，因此必須保持在第三國尤其是俄國的控制之外。1885年後到日本陸軍大學執教的德國陸軍少校克萊門斯·麥克爾（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創造的這個比喻，「在日本軍民腦中留下根深蒂固且難以磨滅的印象」<sup>37</sup>。儘管俄國很長一段時間看上去對朝鮮興趣不大<sup>38</sup>。進入19世紀最後十年情況卻為之一變。尼古拉遇刺後日、俄之間氣氛驟然緊張，支持西伯利亞鐵路的維特不久出任財政大臣，讓外界看到了俄國把手伸到亞洲的決心<sup>39</sup>。日本精英雖然盯着大清，卻意識到未來的對抗遲早會從中日轉向日俄，暗地裏已經把擊敗俄國作為一個奮鬥目標。俄國是歐洲最「驚悍」的國家和危險的根源，外務大臣青木周藏1891年5月15日在《東亞細亞列國之權衡》意見書裏寫道，他覺得為了對抗俄國，可以先聯合中國，但趕走俄國人之後，朝鮮要劃入日本版圖<sup>40</sup>。

這時日本精英頭腦裏，「一度風行的自由民權論為國家主義、日本主義所代替」<sup>41</sup>。軍人影響政局的能力正與日俱增，快速成長的海軍足以支撐新的野心。夢想成為「東方不列顛」的日本把賭注壓在大海之上，除了購買更快的軍艦和速射炮，他們還把美國海軍戰略學家馬漢（A. T. Mahan）剛出版的《海軍戰略論》譯成日文，配發給每一艘兵艦上的艦長，人手一冊，作為必讀的材料。正是美國軍艦1853年的闖入，讓島國「意識到世界的存在，同時也意識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sup>42</sup>。

不過直接刺激日本海洋戰略的卻是北洋艦隊。直到此時，北洋艦隊仍堪稱亞洲第一，裝備上居於優勢<sup>43</sup>。

1891年6月，剛結束閱兵的北洋海軍編隊受邀訪問日本。6月26日，「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6艦組成的北洋海軍編隊從威海衛出發，6月28日到達日本馬關，7月1日抵達神戶，7月5

日駛抵橫濱港。7月16日，日本貴族、眾議兩院議員156人登上「定遠」艦。他們發現，日方首屈一指的「高千穗」號無論大小還是堅固程度都難與「定遠」匹敵。中國海軍看起來唯一比日本差的，只有水兵看起來不太強壯。「參觀之前覺得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可是參觀以後，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實在是吃了一驚呢。」樞密院顧問官勝海舟此前已經參加了一次「定遠艦」招待會，日本《國民新聞》以「敬畏」來描述這位海軍元老的感受<sup>44</sup>。

自北洋艦隊第一次訪問日本（1886年），「定遠」便成為島國擴張海軍的動力，「長崎事件」更直接刺激了1887年《征討清國策案》浮出水面<sup>45</sup>。中國海軍1891再度來訪，雙方均感到了某種不安。島國新氣象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印象深刻，幾次參觀讓他感受到了日軍直追歐美的勁頭。實際上，就在天皇接見丁汝昌和各艦管帶（7月9日）的前一天，日本內閣收到了海軍方面一項提案：9年內建造1萬噸級鐵甲艦4艘、巡洋艦6艘。很快，總耗資約5860萬日元的海軍發展議案被批准了<sup>46</sup>。當年，日方向阿姆斯特朗船廠訂造了一艘4000噸級快速巡洋艦，命名為「吉野」號，1893年交付後它成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艦。

英國人原想把這艘軍艦賣給中國，主持海軍衙門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卻苦於沒有資金。實際上，正式成軍於1888年的北洋海軍這幾年正在走下坡路。1891年春天，戶部以財政緊張為由，宣佈兩年內停止向海外購買槍炮、船隻和器械。這讓李鴻章相當憂慮，此時他還不得不為頤和園造小輪船，比如9月驗收的天津機器局建造的「恆春」號，它的工料運費共花去庫平銀9038兩<sup>47</sup>。

不過北洋海軍更大的危機並非裝備，李鴻章對此並非不知，而且難辭其咎，上一年發生的「升旗事件」他沒有支持受辱的「副提督」琅威理，後者因此憤然離職<sup>48</sup>。這位負責訓練的英國軍官以嚴格著稱，可謂海軍將領們最敬畏的人物，他的離去導致英國撤回擔任教習的其他人員，北洋的管理和訓練水準因此大幅倒退，艦隊基地劉公島上的那些忌憚琅威理的賭館、妓院，生意又因此重新活躍起來。

## 五

糟糕的海防和俄國的東方野心被廣東秀才康有為注意到了，他判定朝鮮會成為一個火藥桶<sup>49</sup>。康 1890 年寫下《保朝鮮策》，準確預測了中國未來將要面臨的尷尬局面<sup>50</sup>。

和 1880 年代先後提出朝鮮戰略的黃遵憲、張謇相比，康有為還沒有一官半職，但在過去幾年幹過幾件大事，在廣東士大夫圈子裏頗有名氣，包括 1888 年 12 月給皇帝上書呼籲變法<sup>51</sup>。康沒有上奏資格，文字卻相當勇敢，開頭便要皇帝「下詔罪己」<sup>52</sup>。此舉或許是為了引起即將親政（1889 年）的皇帝注意，儘管這不大可能，帝師翁同龢倒注意到了此人，覺得他的話有些價值，儘管說的話很容易惹麻煩<sup>53</sup>。那幾年康有為科考運氣不佳，1882 年、1888 年鄉試均告失敗。實際上，若非祖父康贊修死在任上幫他獲得「監生」身份，康有為可能連秀才都很難拿下<sup>54</sup>。

科舉考試要求符合儒學經典，不能離經叛道，這一點對康有為也越來越難。不過到 1891 年，他卻自信地辦起一個新學堂，而且吸引了一批年輕才俊，比如梁啟超，他只有 17 歲，已是舉人，上一年北京會試名落孫山，見過康有為之後大為拜服。引薦梁的陳千秋同樣才華橫溢，他們均就學於著名的學海堂，現在轉而支持康在廣州長興里創辦一所「萬木草堂」，自己甘為弟子。

學堂吸引年輕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新學」。課程表上西方歷史、西方哲學這些東西很多和考試毫無關係，甚至背道而馳。33 歲的康有為比不少學生大十歲以上，頭腦卻比他們更新，比如他把西方富強的原因解釋為「君民平等」<sup>55</sup>。1879 年香港之行改變了康有為對世界的看法，1882 年考試失利後目睹上海租界的繁華，他更加確信這一切絕非堅船利炮所致<sup>56</sup>。隨後康有為變成了上海西方出版物的熱心讀者，其中不少內容轉化為萬木草堂的討論。毫不誇張地說，《萬國公報》和江南製造總局翻譯的圖書第一次拼接出他頭腦裏的「西方世界」<sup>57</sup>。滿足這種探索的除了興趣和敏感，還需要手頭寬裕。儘管康有為那時自稱「生濟日絀」，但他從北京一路旅行

揚州、鎮江到上海「大購西書」卻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條件的。年輕的梁啟超似乎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新知識。不過 1890 年到上海後，面對江南製造總局的西書，他只能「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sup>58</sup>。

1891 年 6 月，《萬國公報》開始連載《變法自強》，它是王韜流亡香港時的舊文，聲稱只要改變制度，就可以迅速扭轉國運，日本正是好榜樣<sup>59</sup>。康有為的很多早期觀念來自王韜，不過他頭腦中的「變法」現在卻自有一套<sup>60</sup>。這一年他完成了 30 萬字的《新學偽經考》，康門弟子中的傑出分子參與了這本書的編纂。1891 年 8 月，《新學偽經考》十四卷由萬木草堂第一次發行，在康有為筆下，儒家經典「古文經」都是假的，他以這種方式否定了所謂祖宗之法。

從漢代開始，今、古文之爭歷時超過兩千年，總的來說前者更尊重考據，後者更看重詮釋，特別是與當下生活結合的「微言大義」<sup>61</sup>。挑戰 17 世紀以來的考證學派漢學，康絕非第一人，但他卻讓這個古老學術問題迸發驚人的能量。他認定「古文」經典為西漢末年劉歆偽造，其偽造《左傳》、《周禮》是為了幫助王莽建立新朝。此前，一些典籍如《周禮》曾為人懷疑，但像康有為這樣論述詳細、言之鑿鑿的還幾乎沒有，很多人懷疑他的見解來自四川人廖平<sup>62</sup>。不過康只承認學問承接前輩學者劉逢祿、魏源和龔自珍，他們均為公羊學派重要代表人物，公羊學派堪稱今文經學最重要流派，鴉片戰爭後它與國家變革聯繫起來，重新釋放力量<sup>63</sup>。

很多人譏笑《新學偽經考》，但它很快流傳於知識圈，各地當年就出現了幾個翻刻及石印本<sup>64</sup>。這本書釋放的能量不在學術，而是轉化為行動。康有為對漢學的排斥不僅因為它對社會道德的冷淡態度，更重要的，「他要重新肯定關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儒家的主要宗旨」，並認為這才是孔子的本意<sup>65</sup>。因此人們可以理解，康有為為何要馬不停蹄地投入到下一部著作《孔子改制考》的寫作之中。不過完成它要等到五、六年之後。這本書大力勸導清廷改制，1898 年《孔子改制考》和要求禁止它的奏章一起被遞到皇帝面前。

康有為的行動很好說明了知識精英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滋長一種想

做某些自晚周軸心時代以來也許從未做過的事的要求，即重新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礎」<sup>66</sup>。他的深謀遠慮之處在於，並沒有因為推行西政、西學而忘了在新的制度設計中為儒家尋找新的生長點。除了將《孔子改制考》繕錄進呈，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還上了《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摺》（光緒二十四年六月），提出應將儒教定為「國教」。不過未來該如何安頓「傳統」並非易事，它和把孔子發明為「改制教主」一樣困難，日後康被支持者稱為中國的「馬丁·路德」，反對者則指責他自視為耶穌。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的行動絕非個人之力，一個圍繞他的師門集團1891年後開始形成<sup>67</sup>。這批年輕學生數量日益壯大，兩年後，正當康有為大力鼓吹廢除八股文時，忽然以鄉試第八名考中「舉人」，弟子麥孟華同時及第<sup>68</sup>。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越來越高，在不太嚴格的考場上，很多人會悄悄偷聽草堂的弟子在談些甚麼<sup>69</sup>。當下一場國家危機不期而至，康和這些勇敢的年輕人不無冒失地投身其中，中國政局竟為之一變。